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一七期 ——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12b)

【研究报告】“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宋永毅
【史海钩沉】“文革”中军队向学生开的第一枪	吴迪
【以史为鉴】侃侃“红卫兵战校”的短暂兴衰	甘铁生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三十)	周孜仁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报告】

“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 宋永毅 •

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许多暴力行为，一些地区甚至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然而，这些暴力与大屠杀却至今仍被刻意掩盖著，不仅官方竭力回避相关的史实，许多知识分子往往也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结果有意无意地扭曲了历史。在“文革”后的官版文献或“伤痕文学”作品中，人们所看到的只是“四人帮”或个别“红卫兵”、“造反派”在为非作歹；久而久之，国人的记忆中便只留下了“四人帮”的嘴脸以及模糊的“红卫兵”或“造反派”形像，抽象的符号式形像便成了暴力和杀戮的唯一罪人，而“文革”时期的领导人、各级政府和群众团体的众多参与者的直接责任却被遮掩了起来，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重要历史界限也被刻意地弄得模糊不清了。

2001年7月在纽约召开的“纪念‘文革’发生三十五周年”讨论会上，一位在美国长大的年约14岁的华裔中学生听了北京1966年秋天的“红八月血案”后率直地提问：“当时的北京有没有政府？是谁允许这些‘老红卫兵’杀人的？”全场先是震惊、愕然，继而爆发出一片掌声：这个从小在法制社会里长大的少年的问题如同一个铁锚般的巨大问号沉入思想之海，触及了问题的要害。

一、北京市1966年夏“红卫兵”恐怖行动背后的支持者

了解一些“文革”历史的国人往往认为，1966年8月发生在北京市的“红色恐怖”只是由中共高干子女组织的第一批“老红卫兵”的过激行为。这些“老红卫兵”在校园里以“批斗”为名杀戮教师；在社会上以“抄家”为名抢掠市民的财产，以“阶级斗争”为名残杀所谓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为名，把近10万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85,196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40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1）

然而，后来披露的一些历史档案表明，这类的“遣返”行动其实是中共早在1962年就开始安排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文革”前担任市长的彭真就公开讲过，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谓“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赶出北京。（2）1966年5月15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发布前夕，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指示。周恩来和叶剑英立刻上书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3）5月16日宣布打倒所谓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这个工作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5月18日起调63军的189师和65军的193师进驻北京各要害部门及所有的宣传机关之外，工作组还有一个长期计划，即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驱逐所谓的“成份不好”的居民。（4）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红八月”当中“老红卫兵”任意对北京市约占居民2%的人抄家、杀戮、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了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上述“首都工作组”的副组长、公安部长谢富治当时曾公开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那些事”（指“红卫兵”的乱打乱杀），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5）

下面通过两个案例，说明国家机器当时是如何指导或参与“文革”中的暴力与屠杀事件的。

案例之一：在北京市1966年“红八月”期间大红罗厂南巷20号发生的一件骇人听闻的血案中，韩模宁一家五口被与其素不相识的“红卫兵”残杀身亡，据国内学者调查，将这些“红卫兵”引到韩家行凶的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罗某。（6）负责当地治安的片警敢于领人行凶杀人，且血案发生后听任凶手扬长而去，这肯定不是民警个人的自行决定，他显然是奉有上级指令的，否则绝不敢如此胆大妄为。那么罗某背后是谁呢？答案不言自明。

案例之二：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榄杆市附近广渠门大街121号的房主李文波（小业主成份）处抄家，这些“飒爽英姿”（实为杀气腾腾）的女“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7）据一位大陆学者的调查，又是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把那些女“红卫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8）

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为“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9）；接著周恩来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1966年9月12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之妻刘文秀判处死刑。其实，就连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都没有说刘文秀本人有“行凶杀人”行为。此后，周恩来还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解放军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这样，“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行为就得到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指导、支持和保护。得到政府鼓励与支持的“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

竟然把迫害、凶杀案件誉为反抗“阶级敌人的报复”的“榄杆市前洒碧血”事件。接著，“老红卫兵”们以打击“阶级敌人的报复”为名，掀起了新一轮更疯狂的杀人高潮。李文波夫妇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经被平反，但无论是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还是公开动用国家机器为“红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未承担任何责任。

“红八月”期间在北京主持杀戮行动以及驱逐近10万城市居民的臭名昭著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是由周恩来的亲信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许明（国务院付秘书长）、李梦夫等人修定后公布的。（10）不难看出，中共上层早已决定了所谓的“净化北京”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计划，而1966年8月“老红卫兵”不过是为当局所用，他们充当了打头阵的法西斯式“冲锋队”而已。可是，到了1967年初，“老红卫兵”也被中共抛弃了，不少人还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

由于被强行抄家、殴打和驱逐的近10万居民不断上诉，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公布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中共中央1967年101号文件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这一文件转发全国。这一“通告”仍然声称，所谓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查有证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等不得返回北京。由此可见，对北京市居民的抄家驱逐是中共中央的既定决策和预谋，并非“红卫兵”的一时过激行为。

二、屠杀行动是“无政府状态”下“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吗？

对于“文革”中的暴力和屠杀还有一种流行的错觉：这些大都发生在“造反”运动兴起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阶段，杀人者大都是所谓的“造反派”。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沃尔德（Andrew Walder）教授和他的助手苏扬博士根据8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的数千种县志提供的资料统计，“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既不是因“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各级政权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最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当时各级政权机构的名称）已经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器之严密控制的1968年。（11）

笔者以为，还可以对这两位学者的重要发现作一点补充：在全国著名的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戮的凶手大多是军队官兵、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团骨干，这些人无疑是国家机器的代表，而他们的屠杀和暴力行动则可被视为国家机器的行为，即政权对公民的直接杀戮，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伸而已。

以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案件为例，此案发生在1966年8月，当时原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下台了，新的北京市委刚成立不久，这时并非权力的“真空期”，何况各区、县委并无人事变更。据现在可查到的档案材料显示：这一屠杀行动起源于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议，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不久前在北京市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讲话要点是：（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的抄家暴力“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会后大兴县公安局立即闻风而动，制定了在县内发动群众屠杀“黑五类”的计划。（12）据调查，大兴县的屠杀行动固然受到北京市区“红八月”杀戮的影响，而直接的指令则来自县公安局，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社的主任、党委副书记，动手残杀“黑五类”、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则大都是民兵。（13）

这种实际上由政权机构策划的对所谓的“阶级敌人”乱打乱杀的现象，1967年至1969年在农村不少地方都出现过，尤其是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等政治运动中。这个无法回避的史实在湖南道县、邵阳县、广西宾阳县的大屠杀案件中也得到了印证。在道县的大屠杀中，组织者是县政府人民武装部部长（现役军人）刘世斌、县委书记熊炳恩等人，执行者是各区、各公社的人民武装部部长和民兵。广西宾阳的大屠杀则由军代表兼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直接指挥“公检法”系统和当地驻军实施。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参与屠杀的人都是党员，还有很多“积极分子”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至今仍或多或少地享受着党员身份所带来的权力和利益。例如，1968年广西自治区当局以执行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为名，对反对派“四·二二”群众团体实行武装大屠杀，当时除了有数万军人奉命参与行动外，最积极杀人的竟多是共产党员。“文革”后官方内部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20,000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9,000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19,000多人”。（14）单是从这个“不完全统计”就可以看出，广西有将近48,000名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史实是，在全国著名的大屠杀血案中，被杀者除了所谓的“黑五类”之外，大多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例如，广西1968年被杀害的11万冤魂大都是“造反派”；湖南道县被杀的人部份是“黑五类”及其家属，其余的多半都是参加了群众组织“湘江风雷”的“造反派”成员。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单纯的受害者；相反，“造反派”在1966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的暴力行为和1967年至1968年的“武斗”中也有著无可逃避的责任。但是，批斗所谓的“走资派”时，即便有严重的暴力倾向，这毕竟与道县、宾阳那种以谋杀为明确目标的屠杀行动完全不同。而在“武斗”期间，双方都拥有武器，参与者也有参加或退出“武斗”的机会，这与弱势群体被强大的国家机器宰割杀戮有极大区别。

“文革”中的“造反派”之所以被党团骨干组成的“保守派”杀戮，根本原因在于后者比较容易获得利用国家机器屠杀别人的机会。大多数“造反派”组织都无法控制中共强大的国家机器（如军队、公安机关和武装民兵）；相反，由于“造反派”成员中不少人被视为“出身不好”、“成份复杂”，他们既可能沦为中共国家机器的专政对象，也可能成为毛泽东主导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文革”时期，毛泽东为了铲除自己在党内的反对派而发动民众“造反”，一旦大功告成，许多“造反派”组织就在1967年的“二月镇反”中被奉命主掌各级政权的军队干部当作“反革命”而遭到镇压。接著，不少“造反派”成员又在1967年底至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成为清查对象。这也就不难理解，在震惊全国的、有5万余人被杀的内蒙古清查所谓的“内人党”血案中（官方统计的被杀人数仅为16,200余人），最早挺身而出反对这一行动的是内蒙古的“造反派”组织，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有某种难以名状的惺惺相惜之感。当然，“造反派”若有机会掌握国家机器，也同样可能制造出类似的血案来。

有一种说法不加分析地把文革时期的社会成员说成是“人人有罪”、“人人有错”，这是十分荒唐的。“文革”中至少有一个社会群体，可以说是根本无罪，甚至没有一点错，却无端地遭到残杀，他们就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政治贱民”“黑五类”或“黑七类”。如果按照中共的习惯表达，以总人口的5%来估计其人数，“政治贱民”的总数达3,000万至4,000万人。从1949年以后直到80年代初，这些“政治贱民”一向被视为所谓的“阶级敌人”，从来就是中共的国家机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绞杀对象，在“文革”中则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无论是“保守派”群众团体还是军队及其指挥下的武装民兵，在对“黑五类”大开杀戒时都不手软。尽管中共的军队、公安、武装民兵及党团骨干（保守派的主要成份）明明知道，“文革”

时期的“法律”（如“公安六条”）严格禁止任何“黑五类”分子参加群众组织，而这些“政治贱民”也一向小心翼翼地苟且偷生，从不参加“派性斗争”，但军队、公安、武装民兵及党团骨干仍然不遗余力地杀戮“阶级敌人”。这种屠杀行动不仅是为了表现杀人者的政治“优越地位”和“正统性”，也是为了向上级邀功请赏。对“政治贱民”的迫害屠杀是中共长期以来制造“阶级斗争”以维持“红色恐怖”政策的延续，在中共建立的“血统论”政治意识影响下，政治迫害者往往把“黑五类”看作是政治对手（如某些“造反派”组织）的“社会基础”，借屠杀“政治贱民”来巩固其权力和地位。

三、军队在暴力和屠杀行动中的角色

1966年底的“文革”高潮时期，各级党政机关曾一度处于瘫痪状态，但很快毛泽东就于1967年1月下令动用军队“支左”，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以恢复国家机器的运转，保证毛对局势的控制。于是军队干部成了各级“革委会”——新的国家机器——的主要负责人；军队还对公安、法院、监狱等重要的国家机器组成部份实行了军管。为了让军队控制局面，毛还赋予军队在“支左”中开枪“镇压”的权力。中共的军队历来深受“阶级斗争”教育的熏陶，服务于党的政治斗争目标，因此，在军队官兵看来，由党团骨干、武装民兵组成的群众团体（多半是“保守派”）自然是他们应当支持的“左派”，而敢于挑战军管权力的群众团体（往往是“造反派”，其成员又有不少人出身于“黑五类”）无疑属于他们要镇压的“反革命”。“文革”中因军队开枪镇压而发生了一系列血案。

案例之一：1967年2月5日，内蒙古军区负责人制定了屠杀在军区大院门口示威的“造反派”的计划，该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故意开枪打死了内蒙古师院的学生韩桐，这是“文革”时期军队杀害平民的第一枪。幸好当时内蒙古的“造反派”组织非常克制，内蒙古军区预谋的屠杀才没有进一步扩大。

案例之二：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在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批准下，调动13个连的军队向占领西宁《青海日报》社的学生“造反派”开枪开炮，当场打死174人，打伤204人。

案例之三：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现役军人组织基层民兵屠杀当地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造反派”成员和“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15）

案例之四：1968年7月至10月，广西军区司令员韦国清等人经中共中央同意，调动数万军队，连同武装民兵，对广西的反对派“四·二二”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围剿；同时，在农村大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仅据今天在官方内部材料上可查的数字，被杀者达11万之众。

军队还参与了其他类型的屠杀案件。例如，1975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昆明军区出动5个师级单位共上万人的野战部队，以镇压“民族叛乱”的名义对云南省蒙自县沙甸村的回民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杀死村民不下千人，还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16）1967年8月2

8日，经康生批准，驻宁夏野战部队某师以“镇压反革命叛乱”为名，开枪开炮，屠杀了青铜峡县的一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筹备处”成员101人，打伤132人。

虽然这些案件本身在80年代都彻底平反了，但血案制造者并没有真正受到法律制裁，而且，为了维护执政党的威信，对相关案件真相的讨论仍然是禁区。

四、领导者的责任

“文革”中发生了这么多惨绝人寰的屠杀案件，中共的最高领导者、“文革”发起人毛泽东是否知情，他对这些暴力和杀戮行动的态度究竟是什么？由于“文革”档案至今仍被严密封存，现代史研究者至今无法看到毛本人对这些大屠杀事件的具体批示。而不少中共的官方回忆录都说：毛一直反对武斗和暴力。或许，毛并没有具体地指示那些士兵、武装民兵去残杀平民；但毛显然没有运用他在“文革”时期的超凡影响力制止这类行动，相反却对一连串屠杀事件保持沉默，事实上纵容了它们的发生和蔓延。例如，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自60年代开始准备把北京市近10万“黑五类”强行驱赶出北京，毛显然不可能不知情；至少周恩来1966年建立“首都工作组”的计划是经毛批示同意的。在北京和全国的“红八月”恐怖中，毛虽然也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同时他也表示：“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17〕毛的这一讲话当年在肆虐一时的“红卫兵”中曾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暴力和杀戮如“星星之火”般地在中国“遍地燎原”，自然就毫不奇怪了。

虽然10年“文革”中的许多类似案例仍被官方掩盖著，仅凭上述案例仍可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文革”中的许多著名的暴力屠杀案件完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有些甚至是当局的决策。无论是毛泽东、林彪还是周恩来、叶剑英，在领导这一国家机器吞噬无辜公民时是完全一致的；尽管他们的看法会有差异，对某些高级干部或平民遭到打击会有不同态度，但在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和残杀“政治贱民”上，他们并没有分歧。其次，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大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因当年“表现积极”而受益。由此可见，把“文革”中暴力杀戮事件的责任一概推给“四人帮”或符号式的所谓“造反派”，既非史实，也严重地扭曲了国民的集体记忆。

【注释】

〔1〕陈东林、苗棣、李丹慧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日文版），中国书店（日本福冈市）出版，1997年，1068页。

〔2〕转引自1967年8月8日《东方红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彭真的原话是：“我们计划要把北京搞得像水晶石、玻璃板一样，没有不劳动的人，没有靠剥削生活的人。流氓小偷打扫干净，当然反革命也不能有。”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31—32页。

〔4〕系笔者采访中共某高级干部获知的情况。

〔5〕见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和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1980年10月16日）。

〔6〕李相，“红八月血案：北京大红罗厂南巷20号骇人一幕”，原载《南方周末》报。〔7〕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李文波”，原载《民主中国》（美国），2000年第12期。

〔8〕据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的调查。

〔9〕见周恩来1966年9月10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10〕“西城纠察队罪行录”，载北京地院《东方红报》，1967年3月9日。

(11) Andrew Walder and Yang S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 Working Papers Serie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2001。

(12) 出处见注(1)。

(13) 遇罗文, "大兴屠杀调查", 原载《民主中国》(美国), 2001年3—4期。

(14)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32页。

(15) 章成, "公元1967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开放》(香港), 2001年第7期。

(16) 马萍, "沙甸村屠杀纪实",《探索》(美国), 1990年第1期, 60—61页。

(17)《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时期出版物, 编印者不详), 第2卷, 1967年, 第204页。

~~~~~

## 【史海钩沉】

### “文革”中军队向学生开的第一枪

• 吴 迪 •

1967年初在内蒙古军区大院门口军队与“造反派”发生了冲突,一名军官奉命开枪打死了一个学生。这是“文革”中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的第一枪。分析这一事件的真相有助于了解“文革”中军队奉毛泽东的命令“支持革命左派”、镇压群众的经过。“文革”并非由“四人帮”一手遮天、操纵始终,军队介入地方政治的严重负面效果也不是“林彪集团”的独自作为。本文所记述的这个事件是了解“文革”史当中长期以来被刻意遮盖的部份的一个重要“窗口”。几乎可以说,由于缺乏对这类真相的了解,中国人对30多年前的历史其实所知甚少,即令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也往往如此。

#### 一、1967年2月5日发生在呼和浩特市“韩桐事件”

1967年2月5日中午,数百名内蒙古学生“造反派”“呼三司”的成员以及工人“造反”组织“河西公司8·18”的成员聚集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军区大院的南门外静坐,抗议奉命以“支左”的名义介入、控制地方政治的内蒙古军区镇压“造反派”组织,当时周围还有上千的围观者。一个20多岁的学生拿著扩音器带领大家呼口号:“强烈要求军区检查错误!”“刘昌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军区大院里一片沉寂,原来堵在门口的军用卡车已撤离,卫兵居然也无影无踪了。在军区办公大楼前筑起了临时工事,持枪荷弹的士兵无声无息地蜷缩其后,主楼顶上还架起了机枪,对准门外静坐的“造反派”。大院外“河西公司8·18”的工人中有不少人当过兵,凭经验觉得军区很可能要采取行动了。

中午12时15分,一名军官右手插在裤兜里,迳直从军区办公楼里出来,到大门口朝那个带头喊口号的学生喝道:“不许胡喊,这是军区!”学生回答:“就喊!”军官威胁道:“再喊就毙了你!”学生的回应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此时,那军官突然从裤兜里抽出手枪,对着这名学生连开两枪,学生应声倒地,鲜血从前胸汩汩涌出。那个开枪的军官将枪放回裤兜里,若无其事地回到主楼里。

军区大院门外顿时乱成了一团，“军区开枪了！”“打死人了！”“呼三司”的学生们奋臂挺胸要往里冲。而在军区大院的主楼里，内蒙古军区负责人向埋伏在临时工事里的士兵们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士兵们精神振奋、摩拳擦掌，准备在镇压学生中立功受奖。但是，大院门外“河西公司”的工人“造反派”站到了第一线，一面高喊：“不要上当，这是阴谋！”一面拉起手来一齐向后退，阻拦住背后向前涌动的人群。最后军区门外愤怒的人们止住了脚步，而军区主楼里却传出了一阵失望沮丧的咒骂声。

这就是1967年初震动内蒙、影响全国、甚至引起外蒙关注的“二·五韩桐事件”。3个小时以后，那位学生伤重死亡。他的名字叫韩桐，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托克托县人，学生组织“呼三司”的成员。医生从他的肺部取出一颗手枪子弹，诊断结果是，子弹打穿肺动脉，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开枪杀人者是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

这是“文革”中军队向学生开的第一枪。这一枪标志著军队奉命介入“文革”的恶果初次暴露；这一枪也显示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在他们制造的“文革”混乱中的左右失据。毛既想通过煽动“造反派”达到打倒政敌刘少奇及其支持者的目的，又怕“造反派”因争夺政治权力而互斗、造成局势失控，只好动用军队介入“文革”中的地方政治，依靠军队来收拾乱局；然而这又陷入了新的两难局面，让军队去控制局势相当于把军队当作“消防队”来用，但让军队在“支左”中介入“文革”中群众组织之间极其复杂的派系冲突，则无异于放手让军队在这样的冲突中“纵火”添乱。中国社会经过了“文革”前17年的意识形态高压和“阶级斗争”鼓动之后，积蓄了巨大的反体制、反秩序的能量，这些能量的形成是社会心理长期被扭曲压抑、群体情绪极度紧张化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能量当时只能通过迎合政治气候的形式（忠于毛、忠于毛的“革命”路线）变相地释放出来，于是彼此对立的群众组织以及准备镇压“造反派”组织的军队，都喊著相同的“忠于毛主席”的口号，彼此却怒目相对，甚至刀枪相向。

## 二、军队该支持哪派组织“夺权”？

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大为赞赏：“《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都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月9日和16日，毛通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向全国的“造反派”发出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毛泽东号召的这股“夺权”之风立即刮到了内蒙古，“造反派”组织纷纷闻风而动。1月6日，《乌兰察布报》社被造反派夺权，报纸更名为《重要新闻》。1月11日，《内蒙古日报》社也被夺权，报名暂定为《东方红电讯》；夺权者是报社内部的“造反派”，他们与学生“造反派”组织“呼三司”、工人“造反派”组织“8·18”、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党委红旗”声气相通。“造反派”控制的《内蒙古日报》新版准备于1月23日问世。然而，就在1月22日下午，千余名立场保守的“红卫军”组织、“工农兵”组织成员在报社内的“保守派”接应下，冲进《内蒙古日报》社准备接管，要把报社的权力从“造反派”手里夺回来。这些人破坏了印刷设备，甚至动手殴打报社的工人。呼和浩特市“造反派”组织闻讯赶来，由工学院的“井冈山”组织一马当先，围住“保守派”，先是舌战，继而打人、砸车。“保守派”因寡不敌众，不得不撤退。正当“造反派”们庆贺胜利之际，军队也介入进来了。

1月23日凌晨，一连全副武装的军人闯进报社印刷厂，带队的内蒙古军区群众工作部副部长高碧当即宣布对报社实行军事接管，报社的所有门口全站上了士兵，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只许进不许出。报社内部的“保守派”组织立即挂出巨幅标语：“坚决拥护解放军接管报社！”。而“造反派”则怒不可遏地上前质问：“为什么军管？”“奉谁的命令？”高碧的答覆是：“我们



奉军区的命令而来，军事接管就是军事占领，一切听从军区的指挥。”内蒙古军区是根据“保守派”的消息决定采取行动的。22日晚6时，从报社逃离的“红卫军”和“工农兵”组织的“头头”到军区求援，晚11时军区黄厚副司令员接见了他们。军区党委认为情况严重，决定请示中央军委。“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回电指示：“一定要调查清楚情况，情况不明，不宜轻易表态。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军队不得动武，可以出面调解。”根据这一指示，军区党委命令高碧先去“工农兵”组织的总部了解情况，“反夺权”失败的“工农兵”组织向高碧提供的自然是一面之辞。高碧随后带著部队来到报社，现场当然是一片混乱，根本不可能“调查清楚”，事实上也不可能识别谁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希望把中国变成一个军营式的“大学校”。但事实上军队心目中的“左派”与毛心目中的“左派”往往是两回事。无论是从观念、出身还是从社会地位的角度去看，军队都很容易与“保守派”组织结成天然的盟友。军队是党的工具，当然支持那些主张维护现存秩序的“保守派”组织；那些主要来自农村、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军人，显然也比较容易接受“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教条和对领袖及执政党的愚忠思想，更习惯用成份、出身、政治面貌以及对党和军队的态度来衡量群众组织的“好”、“坏”。恰恰是“保守派”组织的成员、理念、行为，最接近军队的信念，因此，军队很容易把“保守派”组织认定为“真正”的“革命左派”。于是，介入“文革”中地方政治的军队就成了“造反派”组织批判的对象。在《内蒙古日报》“夺权”事件中，“造反派”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

1月23日晨6时，“造反派”组织把刘昌请到《内蒙古日报》社，与之辩论。刘昌再三对“造反派”解释：这次行动是“来保卫工厂”、“怕发生冲突”。由于报社内的“造反派”群情汹汹，刘昌不得不下令部队撤离报社。但“造反派”仍然与他继续辩论。这场辩论从《内蒙古日报》社转移到了内蒙古师院“造反派”组织“东纵”的会议室，13个内蒙古的“造反派”组织和北京清华大学著名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井冈山”的代表，要求刘昌承认“三点结论”：第一，军管名为“保护机器”，其实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如此做；第二，军区支持“保守派”，打击了“造反派”；第三，这次错误的性质是军区与“保守”势力相勾结，镇压“革命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长达数小时的辩论和争执后，刘昌不得不承认：此次行动没有调查研究，没有依靠报社内部的革命同志，没有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办事，犯了错误，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判。刘昌表示：“这次派军队，在客观上，实际上是从精神上镇压了革命造反派，犯了政治立场错误。”刘昌认错之后，“造反派”组织决定：要成立调查组，弄清事件真相；同时责令内蒙古军区的负责人于1月24日下午2时到《内蒙古日报》社做检查。

### 三、军民冲突的升级

从《内蒙古日报》社撤兵以及刘昌认错并不意味着此事件的结束，军队既已介入地方政治，卷入了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就把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转化成了军民对抗，于是一系列事件接踵而来。内蒙古军区先出兵后撤兵，于是“造反派”组织抓住此事逼迫军区正式公开认错；而手握重兵的内蒙古军区则刀枪相向，严阵以待，以强压弱，拒不让步。面对军队对民众的武力高压，“造反派”起先是请愿求见，然后又静坐抗议，同时大举哀兵，争取舆论和中央的支持。从1月25日开始直到2月5日韩桐被军队杀害，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冲突发生。

虽然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1月23日在“造反派”的压力下被迫承认了上述“错误”，但内蒙古军区党委立即推翻了这一说法。1月24日下午内蒙古军区党委开会，与会的军区党委会成员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王勇成、蒋文奇等人统一了认识，做了两项决定：第一，暂不检查，因为真相不明；第二，出兵、军管、撤兵都是正确的，是为了保护报社和工厂，并

没有支持哪一派。因此，军区拒绝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到报社作检查。

随后，内蒙古军区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激化军民矛盾的措施：军区各单位人员严守岗位、昼夜值班，进入战备状态；将集体收存的枪支弹药全部发还个人，没有武装的工兵、测绘队员、退休干部也一律武装起来；军区作战部增派2个连，加强后勤部和司令部的保卫工作；下令4931、4925、4754等部队的5个连向呼市秘密集结；动用驻呼市部队的5个连，接管重点单位（如呼和浩特铁路局、电厂、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等地）；出动11辆宣传车上街宣传，组织军区政治部人员到待命的部队中进行反对“造反派”组织“呼三司”的宣传工作；向下属各军分区发文，进行形势教育，并大量印发宣传品，介绍“呼三司”“反党乱军”的“罪行”；指示“保守派”组织派人到全国各地说明“真相”；由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赴京向中央军委汇报。

内蒙古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的汇报材料说：“呼三司”、“8·18”等“造反派”组织“反党乱军”，“死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负责人高锦明、权星垣、李质等人，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造反派”组织成员的政治成份“复杂”，混入了各种“阶级异己分子”，其成员的60%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受高锦明、权星垣、李质等人操纵，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组织”；而“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群众组织则多由工人、农民、复员转业军人、下层干部组成，“出身好”、服从领导，是“革命左派”组织。

就在1月23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出笼源于毛泽东对安徽两派群众组织冲突问题的批示。毛指示林彪：“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但是，谁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呢？他们的对立面属于什么性质？如果“革命左派”冲击了军队，又该怎么办呢？毛泽东对此似乎也不甚了了。

1月28日，中央军委又下发了由林彪口授的“军委八条”，其中包括一系列“不许”、“不准”、“不得”等严令。这个文件第1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第5条则规定：即使是左派，今后也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内蒙古军区得此“令箭”，大受鼓舞，对“造反派”组织的态度更加强硬了，军民冲突也随之升级。一旦军队介入地方政治并被授权镇压民众，就必然会以对敌作战的姿态，将手无寸铁的民众视为“敌人”而大打出手，直至酿成军队杀人的血案。

内蒙古“造反派”组织从2月2日凌晨开始，在内蒙古军区大院外连续静坐64小时，到2月4日晚6时仍得不到军区的答覆，于是组成了“见刘昌百人代表团”求见刘昌，要求军区于10分钟内答覆。军区置之不理，于是该“代表团”举旗列队进入军区大院，刚进门20多米，便有数百名武装军人将队伍冲成几段，对“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施暴。这些军人对付1个请愿代表，拳打脚踢，挥舞皮带，用枪托猛击；有的军人抓住女性代表的头发往地上按，有的拉着倒地者的手脚往外拖；一位女学生被几个军人追打，打倒3次直至昏死过去；一男学生被反扭双手，边抽耳光边拉入室内拷打，拍照后又被推出门外；连军区干部的家属小孩也上前助威，扬沙土、扔石头。面对军队的以强凌弱，“造反派”成员只能高声斥骂，“反革命”、“不拿枪的敌人”、“中国人民的败类”、“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呼喊此起彼伏。

求见刘昌的第二、三、四批“造反派”代表被押到军区大楼内，楼门口和每层楼的楼梯上都站著全副武装的官兵，“代表”们每进一道门、每上一层楼都受到拳打脚踢，最后被关进了军队临时设置的“审讯室”。军人们反覆喝斥：交出头头来！谁是你们的黑后台？而自认为奉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的“代表们”则个个大义凛然，以高唱《国际歌》、高呼“毛主席万岁”来

回答军人的审问。恼羞成怒的军人们对着“代表们”架起了机枪。这种场景与中国民众在以往充满了意识形态宣传色彩的电影中非常熟悉的镜头极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大义凛然的不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抗日游击队员”，而咆哮威胁的也不是国民党特务或日寇；相反，对抗中的双方是同“为毛主席而战”的“革命造反派”和“人民子弟兵”解放军。据不完全统计，从2月4日晚6时至2月5日凌晨2时，从军区大院抬到医院的“造反派”重伤者达20人之多。

在此期间，架着机枪的军方摩托车在呼和浩特市的街道上巡逻，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彻夜不停，“保守派”组织则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军队枕戈待旦，重要机关的门口都设立了武装岗哨，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笼罩在恐怖和疯狂之中。

2月5日清晨，受到重创的“造反派”重整队伍又在军区大院的门口聚集，而小露锋芒的军区则森严壁垒，一片死寂。上午10时，军区向“造反派”颁布了3条命令，要求其撤离军区大院的门口，否则后果自负。而“造反派”则继续在门口静坐。中午12时许，发生了本文开头描写的军队杀人事件。韩桐中弹倒下后，虽然“呼三司”的学生们要往里冲，但“河西公司8·18”的工人造反派拚死拦住，这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流血惨案。

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射杀学生韩桐一事并非偶然，而是内蒙古军区的阴谋，目的是通过无端杀人而激怒学生，一旦愤怒的学生冲击军区，就让军区有了大规模开枪镇压的口实，从而可一举剿灭与军区对抗的“造反派”组织的成员。这已为军区官兵私下的言论所证实。例如，看守被军区拘压的“呼三司”学生的一名军人对被捕者说：“我们真佩服你们的策略，打死韩桐那天，你们不冲，如果冲的话，机关枪一突突，两千个也死了。”另一个军人纠正道：“甭说两千，就是三千也玩儿完。”又如，内蒙古军区副司令黄厚半个月后在北京谈判时表示：“当初呼三司冲军区时，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机会动手，如果把他们干掉了，现在省了多少麻烦！”显然，内蒙古军区的负责人认为，开枪杀死一名学生后，“呼三司”的其他学生肯定会冲击军区大院，这样军区就可以用“军委八条”为理由，将“造反派”组织的成员杀一批、抓一批。但工人“造反”组织成员的冷静应对使内蒙古军区制造大规模血案的阴谋破产了。

#### 四、中央调查内蒙古军区制造的血案

内蒙古军区大院门口杀害学生的两声枪响惊动了北京。1967年2月6日，即柳青开枪的第二天，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特急明码电报。全文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均请军区转）：

在内蒙古军区发生的事件，应该立即停止，事态不要扩大。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四方面各派3—5名代表来北京商谈解决。我们于2月6日派飞机来呼市接你们的代表。据悉，军区周围有一师范学院同学中弹致死，如确，应严追凶手和指挥者，查出后应予法办，并向死者家属致唁和予以抚恤。

该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呼三司”的小报将其全文转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电台立即播出消息：内蒙古军民冲突，一学生中弹致死。这一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2月10日下午，周恩来、萧华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召开了内蒙古“四方”（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三司”、“红卫军”）代表的会议。当周恩来追查开枪杀人事件时，内蒙古军区矢口否认自己的责任，于是周恩来决定立即派内务部部长曾山带法医赴呼和浩特市调查。2月12日，内务部部长曾山率调查组抵呼和浩特市验尸，查明死者乃被军队的手枪子弹射杀。

当中央开始追查杀人的责任者时，内蒙古军区主使柳青开枪杀人的将军们害怕了。他们一方面在铁证面前坚不认罪，一方面试图消灭证据、搜集伪证、制造假相、嫁祸于人。军区下令由柳青的下属（一位营职军官）另行组织一个调查组调查此案。内蒙古军区给调查组布置的任务是：一，提供证人，证明军区没人开枪；二，设法证明此案是“呼三司”或“8·18”自己制造的；三，证明那些可能提供案件真相的人是“反革命”、“坏份子”。

内蒙古军区准备制造血案之前曾命令军区管理局临时组织了一支担架队，他们中的两个人曾亲眼看见柳青开枪。为了“消灭”证人，在柳青杀人的当晚12时，这支担架队的12名成员被内蒙古军区逮捕，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和笔记本。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他们被秘密审讯多次，每次都伴以毒打。当这些曾参与痛殴“造反派”的军人秘密写信向周恩来求救后，遭到了更残酷的拷打。然后，内蒙古军区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将这些军人关入大牢。此外，内蒙古军区还毁坏了柳青作案用的手枪，逮捕了抢救过死者韩桐的医生田光、将韩桐送到医院的司机高交云，甚至监禁了曾传播真实消息的军官家属侯凤英。

与此同时，内蒙古军区与“保守派”相配合，全面夺取当地党政机构的权力，继续镇压“造反派”，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军区参谋长王良太曾私下表示过，当时内蒙古军区为了逃避责任而不得不“全力对付北京”。2月9日，内蒙古军区机关和直属分队的干部、战士数百人在军区门外痛打一百余名“8·18”“造反派”和三军院校的学生。参谋长王良太亲自指挥，将70余人拉进军区大院毒打，然后关进大牢。当天，军区以“机关联总”的名义出动了60余辆卡车，满载持枪荷弹的士兵，在全市武装游行。

枪杀事件发生后的2个多月里，周恩来先后8次接见内蒙古各方的代表，厘清事实，调解纠纷。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当时被内蒙古当地称为“红八条”）。虽然周恩来早在3月13日就下令拘留柳青，可是直到“红八条”下达后，柳青才在内蒙古军区负责人歉疚的目光中迈进“监狱”的大门。然而，在拘留场所的“牢房”里，柳青不但可享用烟酒、糖果，而奉派看守他的战士们则时常陪他下棋、打牌。

内蒙古军区主要负责人制造了枪杀案件，事后又千方百计地抗拒对真相的追查，最后，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军区参谋长王良太、军区副政委刘昌、军区党委成员张德贵被中央定性为“反党集团”。然而，“文革”时期军队介入内蒙古地方政治的后遗症并未因此而消失，此后内蒙古的局势一直非常混乱，摩擦冲突不断。这种局面的出现显然与毛泽东利用军队控制局面的决策有直接关系。

□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

【以史为鉴】

侃侃“红卫兵战校”的短暂兴衰

• 甘铁生 •

—

母校又要举行校庆了。这是跨入21世纪的第一个校庆。班主任童常珍老师电话嘱我写篇回忆文章。我答应了。其实，此前历来的校庆纪念前夕，周鸿钧老师也曾嘱我写点东西，来纪念我们在学校成长的岁月。我也曾答应过。但每当提起笔来，都很为难，写什么？怎么写？如果只是写当年我们清华附中如何朝气蓬勃地在“德智体”方面，成为全国最令人瞩目的重点中

学，全校师生如何同心同德地开创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的新境界，我也能写。毕竟，那个年代中，学校养育了我们，栽培了我们，我们的一生，不可磨灭地保留着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中最可贵、最优秀的成份。

但是，我始终什么也没能写出来。

为什么？我想，毕竟，自己已经是走出校园有30多年的人了，面对历史，面对还在继续培育着新人的母校，我不能粉饰，不能浅薄，更不能用违心的表白来支撑门面，我觉得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深入地探讨点什么，也许对我的良心，对社会的认知，对一代又一代满怀希望的新学子，才更有益处。

这就是我们很多老校友一直在私下里探讨的问题：作为那么出色的重点中学，在培育出出类拔萃的青年学子的同时，也成了孕育红卫兵的温床，这仅仅是历史的妙手偶得吗？当然不是。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二

清华附中校史上有一段非常时期，这就是“红卫兵战校”短暂的兴衰历史。粗略地捋一捋当年的线条吧——

1966年5月29日，世界首创的、充满中国特色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宣告成立；红卫兵，顾名思义，红色政权卫兵之意是也。

6月24日，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文，以大字报的样式张贴在校园里；文中宣称：“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此后的7月4日，他们又张贴出第二张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其中引用了这句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两文均见本刊zk9603a——编注）

7月28日，在江青出席海淀区的一次“文革”工作大会上，我校红卫兵将论“造反精神万岁”的两篇文稿委托毛泽东的夫人、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转给毛主席。

8月1日，毛主席他老人家回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还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见本刊zk9609a——编注）这表明，作为政治家的他，赞成我校红卫兵对他的理论的解释，他支持他们照此行动。

8月15号，工作组撤走后，“文革”的新高潮到来了。来我校“取经”的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络绎不绝。每天，校园里亚赛集市般红火，这些“取经”者将造反精神取走，再去煽风点火……

8月18日，毛主席他老人家身穿军服，臂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了百万红卫兵。记得当天晚上，没资格去接受接见的我们这些同学和老师，被传到教学楼前的场地上，听红卫兵们讲述自己被接见时的激动心情。一个低年级胖乎乎的女红卫兵扯着嗓子喊：“今后我再也不会有私心了——我和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领袖握过手了！”也正是那个夜晚，红卫兵把“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这个后来被毛主席声称“十分讨厌”的口号引进校园。

当时，我和大多数师生一样，觉得这个口号是那样新鲜，喊起来是那样带劲，还觉得我校红卫兵真是很了不起，他们能发明这样的口号（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四个伟大”是谁发明的），实在是有着极端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才能编出来的。此后，学校里开始了所谓的“早请示，晚汇报”，在食堂吃饭，也要手捧毛主席语录，将它举过头顶，一边挥舞着一边高喊“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如此三呼万岁之后，方可用餐。

不久，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风潮中，已经掌握了学校领导权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将“红卫兵战校”的匾牌替换了清华附中的校牌。破天荒的，中学生历史地执掌了学校的领导权。红卫兵的领导核心就是全校的领导核心。各班也成立了“红卫兵领导核心小组”，自然都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种儿。红卫兵开始依照“造反”的理论来统治校园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理念犹如当时悬壶济世的灵丹妙药，没哪个掌权人不拿这个法宝四处招摇。兴起了抄家风。校长、班主任老师的家大多被自己的学生抄了个底儿朝天。那时的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真紧呀！我们把过去的笔记翻来覆去地找，看哪里埋藏着授课的教师用障眼法掩蔽起自己攻击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词……太多是事情充满荒谬和无理性，充满了盲从、狂躁、疯狂、僵化和愚昧，而人人又都觉得自己在完成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以为自己在忧国忧民、在民族于危亡之际担当起了避免“亡党亡国”的重任……每天在学校里学“毛选”、学“文革”文件、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要不就去其他院校“支‘左’”。时不时地在大操场或5楼大教室里批斗校长、教师或“修正主义苗子”；批斗会上，一些教师被迫发言揭发同事或亲人，记得有个女老师迫于压力，在发言时多次高叫道：“我揭发一个大阴谋！”可当她一讲述这个阴谋的内容，却又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小事，于是她反到成为批判对象。一天，崇文区的红卫兵在抄一个所谓的“黑五类”家庭时，遇到了房主的拼命抵抗，竟然将一女红卫兵砍伤。消息迅速传遍北京市，记得那天，我校红卫兵领导迅速行动，先召开了全校大会，以巨大的无产阶级义愤通报了这一“阶级敌人疯狂搞阶级报复的行动”。对毛主席的红卫兵运动的反抗立即激起了全校师生的强烈愤慨。一个女红卫兵在大会上高喊道：“我们就要用红色恐怖对付阶级敌人的白色恐怖！”短暂而群情激昂的师生大集会后，回各班召开班会讨论如何落实对阶级报复者施以“红色恐怖”。一些班级开始了血腥的打斗。曾经“死保”校党委的“狗崽子”们受到同学用“板带”的狂抽猛打。然后被驱赶到大操场上拔草。记得一个炎热的下午，万邦儒校长和很多教师被驱赶到学校的大操场积水的地方，让他们将积水舀干。在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着他们的革命小将的呐喊声中，他们紧张而又惶恐地不直腰地一干就是几个小时，谁若稍一直腰，就会受到围观学生们的怒吼，有学生会用砖头拍在他的背上，让这位老师来个“王八驮石碑”，砖头若因直腰而落入水中，那么这位老师不是挨骂就是挨一顿痛打，汗水和着泥水将他们浸成肮脏的水人，但那脏水泼出去又流回来，他们就这样站在泥水里害怕地做着无用功，我特别注意到万邦儒校长还强作笑容，特别卖力气地舀着泥泞的雨水……校园最醒目的地方张贴着“鬼见愁”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记得还走火入魔地为此荒诞不经的对联展开过疯狂的“辩论”，有人认为应改为“绝对如此”才更贴切……当然，只有那些出身好的人才有资格上台去对此评头品足，出身不好的则只有旁听的份儿。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在“红卫兵战校”里如火如荼地展开。一位女同学因无法忍受批判和巨大的精神压力，竟去卧轨，虽“自杀未遂”，却更是引火烧身说她企图以“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来发泄不满；也有教师自杀。热爱“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已经有了“专利”——反革命“黑帮”和“狗崽子”还有“保皇派”是不许戴风靡全国的毛主席纪念章的。即使他们把纪念章戴在胸前，也会被明察秋毫的红卫兵小将一把揪下。还得遭到痛斥，说是他们玷污了毛主席。

高三年级一位姓郑的同学是著名的“狗崽子”，曾“死保”校党委，“红八月”中，他品尝了“红色恐怖”的滋味——他被三五个同班同学（还曾是最要好的同学）围在教室的地上，用带有巨大而沉重的铜头军用皮带，在全班同学的呐喊声中，足足抽打了将近两个小时，尽管他是校运动队跑、跳、投“三项全能”运动员，很抗打，但还是被打坏了一个肾。（他们班的教室

正在我们班楼下。那天，我们正在听本班红卫兵核心领导成员训话，突然，听到楼下桌椅板凳传来急剧的挪动声，知道楼下出事了，我们纷纷跑到他们教室——记得我是站在后排一把椅子上心惊肉跳地目睹那血腥拷打场面的。）此后，无论他怎样检讨，也改变不了他被“专政”的待遇。但他固执地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自己的外衣上，终于被威胁说，再看见他戴毛主席像章，就如何如何。在万般煎熬之中，他终于想出了“绝招”——把像章别在肉上！他幻想胸上的肉能像手掌那样起老茧，也能像耳坠上穿孔承受耳饰那样能自如变换着戴上花样繁多的像章。但胸脯不接受金属别针。他想了很多办法均告失败，便终于狠心将像章别在肉上。此后，伤口在疼痛中化脓。他每天多次往伤口上涂抹碘酒。在日日夜夜的煎熬中，终于结疤了。他盼望那痂变成老茧，但事与愿违，终于有一天，那搀杂着白色的脓与紫色的血的痂脱落了，除了胸上的疤痕，并不见老茧，这个失败让他躲在没人的角落里嚎啕痛哭……

太多的事情无法在本文中一一列举，我只想说，回过头来再看那个年代突出的特点是，种种疯狂而又丧失理智的举动，充满着原始的野蛮和冲动的劣行，都是被冠以崇高的革命的名义、打着“真理”的旗号而发生的。然而，当年真正能看透的人却如凤毛麟角。于是，“文革”便被一浪一浪地推向纵深的地步。“伟大的战略部署”像万花筒般迅雷不及掩耳地变幻着景致。1966年10月，毛主席老人家又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老兵”们所坚守的阵地一日间土崩瓦解。“红卫兵战校”终于在哗然不恭的嘘声中夭折……

三

尽管“红卫兵战校”如来去匆匆的闹剧般昙花一现，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应该是严肃、深沉的。它是清华附中的伤痛，也是我国教育体制的伤痛，它留下的应该是不可磨灭的永久话题。因为，所有的中国校园都在那个年月经历了血与火的劫难。有意无意地避对那段历史的探究是民族的耻辱。

1998年，韦君宜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那部颇有影响的《思痛录》出版了。她“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在“一件件摆出来”“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的文字中，夹杂着她这样一句愤愤不平的话：“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未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自己的思想是究竟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季羨林先生也在一篇谈当年被学生抄家、批斗情景的文章中这样说：“我想，来我家抄家，搞打、砸、抢的这些家伙是什么人呢？……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8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据我看，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并没有多少‘伤痕’。真正有‘伤痕’的人，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并没有把该说的话说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且其中蕴涵着一些危险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前进。”“我更愿意中国那些有头脑的学者，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

我觉得他们的疑问很在点儿。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怎么会变成文化上的虚无主义、怎么会仇恨一切、横扫一切的呢？其根源在哪里呢？怎么会在当年那样气冲霄汉、壮志凌云地“横扫千军如卷席”？为什么红卫兵不在大学、不在工厂的工人中、不在农村的贫下中农中、不在知识分子集中的科研单位或机关里首先诞生，却偏偏在中学诞生？是中学生智商高吗？是学问好吗？是政治“过硬”吗？他们已经领先具备了先知先觉的革命先行者的素质了吗？我曾经试图寻找当年的值得夸耀之处，不幸竟只发现了浅薄的执着这一可悲的长处。真的，作为一个人，中学生实在是太欠火候了。可恰恰是这种欠火候，他们才更容易被人玩弄于股掌，才使他们在某个时空段里一遇适当空气便自命不凡。其实略一琢磨便可明了，当“政治第一”的口号风靡以前，我们在“文革”前的17年里，已经进行了多次“运动”，如1957年的“反右派”、

1959年的反右倾、然后是“四清”，这期间还夹杂着对国际修正主义集团的论战和对国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的批判……在学校里，则日益强调贯彻阶级路线。应该说，“文革”的到来，正是将“政治第一”的路线推向极至的必然走向。换句话说，没有17年“洗脑”的过程，也就不会大面积地收获“向阳花”，而没有向阳花的唯命是尊，就不会有群众广泛参与的基础，自然也就难以呈现“轰轰烈烈”了……

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获奖感言中这样说过，20世纪较之任何时代都更加残酷，一切教人惊心动魄的劣迹败行，到50年代以来仍没终止。对于亚洲来说，德国的慕尼黑精神（即纳粹精神）在亚洲变种为日本军国主义；到了60年代中期，红卫兵运动的狂热冲动，同样体现着这种“教人惊心动魄的劣迹败行”。正如我们常常说的那样，如果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深刻检讨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劣行，必有重蹈覆辙的一天；同样，如果我们不深刻地以史为鉴，也难逃这种精神病灶在适当的时机里旧病重发的命运。毕竟，所发生的事情并非昙花一现的历史插曲，而是民族巨轮深陷的印辙。

当然，无论当年的各派，比如“老兵”、四三、四四派，都很愧对当年在校的所作所为，也在多种场合以多种形式表达过愧疚。说明当年的中学生们已经对那种时代的厌恶和反省。是的，人们清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无论五四运动还是一二·九运动，都是大学生带的头，从来没轮到过中学生去当“革命先锋”。但在“文革”中，中学生们终于在“青苹果”时期，成了“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的革命闯将。当时，我们中学生真是自豪得很，终于有英明领袖发现了中学生的价值。现在才发现，当年的光采犹如屎克螂戴花，臭美得过份了。毕竟，当年“煽风点火”的“伟大历史功绩”，已成为20世纪人类劣迹的集中体现。能够让童贞未泯的中学生肩负起“革命”重担的政治家真是太有魄力了。但多年以后，这些勇挑重担的中学生才发现，那个“担子”里装的东西其实集中着华夏文明5千年糟粕之大成……

虽然如过眼烟云般短暂，但与“红卫兵战校”相链接的一切潜在的或露出台面的东西，都是相当有“学问”的。这是一部很大、很厚重的书。每当我回首“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的往事，都不由得想起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及波尔布特。在理论及行为逻辑上，他们有如孪生兄弟。不同的是，波尔布特一度执掌了国家权力，红卫兵只有限地执掌了学校的权力……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世界上所有恐怖组织都把训练中心放在青少年身上，不是已经有报导说，很多惨无人道的屠杀，都是经受过恐怖训练的十几岁的青少年所为吗？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极其稚嫩且可塑性极强的青少年（包括一大批青年学生），是大行恐怖之道的“恐怖家”们使用最顺手的一张牌。由此推断，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便一目了然了。

罗里罗嗦地说了这么多。应该说，我并非在本侃文中去声讨某个人、某件事，而是把当年发生的事情放在世界或民族的大背景下胡诌点个人的感想。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知道，红卫兵运动的诞生，并非只是历史的插曲，而是历史的必然，17年教育的必然，即使不存在清华附中这所学校，也会在红华附中、黄华附中、绿华附中诞生。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同时也都对世界上一切“原教旨”主义充满了厌恶。它们理应成为老祖父的马褂沦为博物馆的陈列，但却依然有人乐此不疲地披着它到处招摇。可是面对如此光彩夺目地变幻着的网络世界，以不变应万变的坐标，又能把你带到哪里去呢？所以我想，以史为鉴，还是能够使人多少清醒起来的。

□ 作者为原清华附中高632班学生

~~~~~

## 【往事追忆】

### 红卫兵小报和我（三十）



• 周孜仁 •

## 27，无法重归的私人生活

华蓑山根据地解散，标志着1967年的重庆武斗正式结束。国庆节快到了，我去南岸看姐姐，近三个月，这是第一次进城去。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现在是‘和平民主新阶段’，到处是战后恢复时期的景象 / ……从两路口一直走到红港（按：即朝天门），又走回来，仔细观察了一番战争的遗迹和战后的恢复景象 / 航锋（按：指河运校）、解放碑交电公司可算是首屈一指的战争纪念物，经过战火摧毁之后，全剩些光架架了。红港大楼和我校的六大楼差不多，密集的弹痕记下了血痕斑斑的‘八·八惨案’。在大楼前的街心花园里，有一个新垒的土堆，上面压满白花，前面有一个木牌，上写：‘八八事件殉难烈士’…… / 街上人不少，因为商店全关着，游人只好在街上溜达。这些人大多和我一样，是来看稀奇的。 / 电车线正在修复。‘人交815’写出大标语：‘向抢修线路的五十四军学习！’ / 一辆辆汽车在街上奔驰。为了避免检查站的解放军同志多此一举，因此车上都挂着牌：‘邮政专用车’、‘粮煤专用车’、‘蔬菜专用车’、‘毛著印刷专用车’等等。 / 小街上的垃圾堆如小山，现在正被一车车拉走。 / 这一天，恰好是大太阳。九月明丽的阳光下，山城像在春天里一样苏生了。……我心里非常舒畅，我真想喊一声：‘新山城，你好！’”

我开始领工资了。时间是九月二十八日。我在日记里写道：“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领工资，这个日子是值得纪念的。我不再是消费阶级了，而是一个用自己的劳动来为人民工作、养活自己的人了。工资是这样一个标志。 / 在过去读过的诗歌中，我记得，是歌颂过这件事情的。但我没有心情写诗。想起死去的伙伴，那些勇敢的英雄……我感到难过。”工资标准是42点5元。我给父母寄去了二十，余下的，除了交伙食费，我为自己买了一件灯芯绒外衣。动乱一年，我的衣物已丢失殆尽。后来发配云南边疆，出发时，所有行李总重仅仅13公斤，除去非常压秤的一大捆书籍、笔记本和画册（还有我保存至今的文革资料），衣物重量几乎为零。我差不多是赤条条走向远方的。

同学们都陆续返校，开始了“复课闹革命”。11月4日，全校学生在风雨球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动员会。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中央调查组陈斌一行、驻军首长兰亦农、白斌一行均出席了大会并演讲致辞。《815战报》第46期用了整整两个版面刊登大会消息及首长讲话，还配发了社论。紧接出版的第48期（第47期为与《山城战报》的合刊）又继续发表社论：“让教育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发表头条消息：“欢呼我校教育革命高潮的兴起 / 不是春光，胜似春光”。年初三月，革联会如日中天、形势“一派大好”之时，重庆大学也曾搞过一次“复课闹革命”，那次活动因所谓“反击二月逆流”而迅速流产。这回不一样了，不是因为这次的号召更鼓舞人心，而是半年多的经历让人对“大革命”心灰意冷，大家精明了许多也务实了许多。把壮丽的理想和官场的是是非非留给政治家吧！老百姓靠空头政治是过不了日子的，要让自己在社会立足，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一身过硬本领。于是，同学们纷纷把老师重新请回讲台对自己传道授业。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初期、和所谓“红八月”的情况恰恰相反，学生们对那些曾被自己批判过的老师、“学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在已经不再反感，甚至简直就有些巴结了。毛泽东的文革，在他所期望的若干领域，开始悄悄走向自己的反面。

采矿系的同学，入校时一个个绝对都为自己黑矿红心的未来而骄傲，可现在不了，他们非常清楚在暗无天日、充满冒顶、爆炸、灌水等诸种危险的井下作业意味些什么。空泛理想的滋味他们已经尝够了。他们需要实惠。不用谁批准，全体同学一致宣布“造反”：通通转入机电专业学习——这个“革命行动”日后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在我所认识的采矿系校友中，至少，

一位丁姓同学，后来成了云南省著名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专家，而不是成天在矿井里爬进爬出的黑不溜秋的技术员。

五年级的同学已经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好学了。比如我，恰恰在毕业设计完成的第二天，无名湖畔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便横空出世。我们，接着全体中国人的生活都被彻底搅乱。既然领袖号召，还有什么犹豫？干就是了。从此干了一月又一月，冥冥之中一干就整整一年！一年革命，工资全免，哥儿事后想想实在太吃亏。现在好，终于该领工资了：记得这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发的话——就为这句话，1976年老先生辞世，大伙儿要为他流眼泪为他十里长街送灵柩就绝对有理——因为冲着这份儿，五年级同学的革命彻底性就远远地不如低年级同学。武斗一开，接二连三牵四挂五地全往家里跑，像笔者这样“坚持战斗”的痴迷者确当少数。回家何为？一曰避祸。五年寒窗好容易熬过，马上该挣钱了，死之可惜；二曰谈情说爱。谈情说爱在我的大学时代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1963年，上大二，高教部就发来了条文明令禁止，共青团员带头实行。记得团支部的组织生活曾经反复交代政策：有朋友的，一律交出情书，和对方一刀两断，并作出深刻检讨。没有朋友的——没有朋友好说：以前者为鉴戒，下不为例。我是没有现行的，但我清楚记得哥儿们交出情书深刻检讨时的狼狈相。文革动乱，所有旧秩序一律砸烂，原先转入地下的故情旧爱全部反弹，轰轰烈烈浮出水面。有的乾脆就宣布结婚。要结婚就需要钱。钱比革命理想更实在，国务院总理发话给钱，谁能不积极呢？大家自然从四面八方回校来了。

报社的人也都回齐了。含历任编辑，含成都版的编辑，都回到了设在原党委小院的编辑部，热热闹闹聚会了一次，开座谈会，还照了相，然后留下部份骨干，其余散伙，各回各的系班。历任编辑凑在一起，共二十多个，在民主湖畔留影一张，在风雨操场留影一张，人太多，镜头幅面有限，有几个人只得爬到树上站位，所以大家管这张纪念照叫“树倒猢猻散”。

既然“树倒猢猻散”，既然高年级同学，包括我，已经开始领工资而且马上开始毕业分配，编辑部自然就该由低年级同学接班了。大家一致推举王亦富，就是绰号“王二麻”的机械系一年级同学做主编，他没有经过太多推辞，便接受了。王，四川乐山地区人，乐山山青水秀，人杰地灵，一代才子郭沫若就生于斯长于斯。王也自幼聪明，还上小学就常参加镇上的年节川剧演出。他喜欢和人扎堆，喜欢自我表现，命中注定他将在文化革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最终为它殉葬。——1977年，他时任十三军军长秘书，因为替人起草过给江青的劝进信而被审查，自尊心无法忍受，于是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战报召开散伙会，时值八一五政治上豪气正雄，有很多风头可出，大家一致推举王作主编，他很容易便接受了。更何况，武人已经结束了他们的光荣，再次轮到文人表演了，这真是再好不过的机会。检看那以后的若干期报纸，好像还是我在组织编排，一些重要文章还是我在撰写，但很多具体事务都由王安排了。我这样做，用八十年代褒誉下台老干部的话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

我算功成身退了。一年文革，为我的大学生涯划了一个重重的圆满句号：我为此而自豪无比。进大学第一天，我曾坐在宿舍走廊的路灯下庄严地写过一篇日记，模仿我国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意思，写了一个“我的大学五年计划”。这本日记后来不幸丢失，该计划的具体条文也已十分模糊，但大意却记得清楚。大意是，五年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个岗位，人们将发现来了这样一个年轻人：他朝气蓬勃，工作勤奋，热爱生活，富于理想……等等，反正他优点很多因而倍受领导赏识和群众赞扬。大学五年，我确实以为自己在政治学习、业务学习、社会活动等诸方面都表现出色，继而在文化革命的血火考验中，也绝对没有拉过稀，还出足了风头。我以为我兑现了自己的设想，向党向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甚至——这样说吧，大家谈情说爱，而我，连这个敏感问题都顶住了——在十分模糊的“个人五年计划”中，我的确也写过一条，宣布大学五年间必须集中全力学习，不得与任何女生谈情拍拖。现在，既然计划全部兑现，我可以考虑自己的私人生活了。

我们班管毕业分配的小组长黎专门来报社找我，他问：你的毕业分配自愿准备填报哪儿？他告诉我，同学们的分配自愿表差不多都填写好了。他还对我说，按我这样好的条件，可以随便挑好的地方、好的单位填，别人是没法和我竞争的。他所说的我条件好，除了上面我说的那些，还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就是：我没有女朋友，分配时不需要照顾未来的“夫妻关系”。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反问：还有什么地方没人填？

黎说：西藏。

我追问：西藏一共几个名额？

他答：两个。

我说那好——依旧没有犹豫——我说，我曾说过毕业后要到最艰苦的地方，我绝不食言，我就去西藏吧。

事情就这样敲定了。我在他交给我的分配自愿表上很痛快地填了如下三个自愿：第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第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第三：“西藏”。

其实，我在冠冕堂皇说上面那些话的时候，暗中已有自己个人的打算。我之所以问西藏几个名额，其中就已经暗藏着一个无法挑明的原因：我以为那一个叫Z的女孩，一定会和我一起去漂泊天涯的。

我在前面曾经写过，还在大一，在夹竹桃鲜花盛开的校园小路，我曾邂逅了一位女孩并一见钟情，从此后便一直执着地暗恋着她。只是大学时代的政治高压和过于神圣的理想使我一直没有机会更没有勇气对她吐露私情，这样，另一位男同学理所当然地和她相恋——正是文革的动乱环境使他们轻松地坠入爱河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另外一位女孩，我的同班同学——就是那个Z，多年来，却对我抱有那么深沉的好感。她的好感让我十分感动，无法拒绝。1967年8月，当嘉陵江对岸的炮弹夜夜在头顶呼啸，给黑暗的天空粗暴地划出红通通的弧线，在深垂窗帷、挥汗如雨的斗室，面对着死亡，我确信她是我最终的选择了。于是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我说，我随时都准备死去。这封信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永诀。我说，如果有一天战争会结束而我还能得以幸存，我们定然又会见面并且可能面临未来命运的选择，比如说：毕业分配。我说，我们已经相识五年，我很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结论：反正，我们都这么大了，已经用不着脸红……那时，她已逃回远离重庆的老家。我查阅了日记，这封信是8月10日写的，但直到9月2日战事平息才从邮局寄出。

她很快给我回了信，她在信中第一次明白地向我表白了好感。表白得热烈而且肯定。这就让我这个对女性心理全然无知的“胜利者”产生一个极端错误的想法：她定然会服从我的选择，（因为我是这样的革命而全无自私自利之心呀！她能不服从吗？）心甘情愿地我一起去浪迹天涯的。我错误地认为和她讨论分配去向已经是多此一举了。因此，根本还没来得及和她见面，我就向分配小组表了态。我的“自愿”很快被传为美谈同时又极大地伤害了Z的自尊心——她当然是知道了我的选择。她需要我向她作出解释。

这是重庆冬日一个晦暗的黄昏，我和她在嘉陵江边一株巨大的黄桷树下约会。我感觉得到，她是鼓足勇气来和我见面的。但一路上她却一语不发。坐下了，是在树下一个巨大的石头上。她仍然沉默不语，甚至有些局促。我终于忍不住先开口了，我说：

“我已经填报了自愿，你听说了吧？”

“知道了。”她说。

那么，我问，你意见怎么样？

她低头不语。夜色在四周弥漫。我有些急了。因为我马上要去出席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四川三大组织：重大八一五、成都红成、南充临联的联席会议，商量关于在全四川“倒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她一直不说话，我只好摊牌了。我说：现在，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西藏，我们就永远生活在一起了；如果你不愿意，我们之间也就不再存在任何超过同志之间的友谊了。——一时过几十年，我至今还记得清楚，我的原话就是这样，像最后通牒一样冷酷和不可动摇。

她不说话，用顽强的沉默进行抵抗。我于是追问：你愿意吗？

沉默许久，她终于说了：我正在思想斗争。

我松了一口气。我说：好吧，你再想一想吧。我等你消息。接着，我非常残忍地告诉她，我要去出席一个重要会议，我需要提前走了。

人说，时光如白驹过隙。现在一转眼，我们都已年近花甲。我不知道那位可敬的Z能不能读到我的这段文字。但是，行文至此，我深深地为自己的粗暴、无知和丑陋而痛悔不已。我希望能得到她的饶恕。

我离开她，径直去重大校务办公楼参加了整整三天的会议。前面说过，正是这次联系会议，直接促成了我那篇混蛋文章，那个我一生都没有走出的阴影：“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报应吧。我伤害了一位可敬的女孩Z，而命运，对我进行了惩罚。

我还必须坦言的是：就是于炮火连天之夜给Z写信后不久，一群中学武斗人员从“江北沦陷区”兵败撤退到了我们学校，一部份人还住进了我们所在的党委小院。于是，有几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就成了编辑部的常客。她们甚至还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常委”，因为她们认为，机关报报社的主编，从级别上应该是总团常委一级的。在大学生面前，她们显得那么的幼稚无知，以至我们仅仅只能把她们当成调皮贪玩的娃娃。但是我（甚至包括其他的编辑）很快就发现了，她们其中之一：S，对我却表现出了超于一般的好感，她的天真无邪对我发生着一种难堪的诱惑。我不敢承认这种情绪，更不敢向她拒绝这种双方都以为模糊不清的东西。于是我对自已定出计划：等一等吧！反正什么都没有发生。等到我和Z的事情一定下来，我就正式通知她，那时候，这个难题就不解自决了。

但是，毕业分配的方案迟迟定不下来。听说四川省分办主任、被八一五臭骂为“烂萝卜”的张西挺对于重庆大学以一派掌权而完成的分配方案颇多歧见，事情就无限期地拖了下来。对此我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Z干吗老不给我回音呢？这种马拉松似的延宕对于我急于想对与S关系下结论将非常不利。我不能不托人给Z捎信，但没有回答。第二次捎信，情况也如石沉大海。面对两个女孩的好感和完全不确定的因素，我陷入了极大的难堪。

能够让我解脱的，也许还是只有乱麻麻的社会动荡。我一如发狂的陀螺，需要有鞭子不停地抽打以维持旋转，一旦停住旋转，我就会匍匐倒下。这鞭子就是争斗、撕杀、狂热。事情过了很久，当各方关系都已尘埃落定，Z曾非常宽容地告诉了我，那时候她并非不理解我的革命热情也并非不愿意和我一起奋斗天涯，她只不过希望在我的思维框架内和我一起认真讨论一些今后的实际生活，包括成家和生孩子。而我，竟连这个机会都不给她！她怎么能不彻底失望呢？而年轻的S，也许比Z更多些激情和不懂事，因此她毫无保留地对我的革命狂热表示认同和钦佩。我的虚荣心很容易便和她的欣赏发生了共振——命中注定，我只能沿着荒唐之路，稀里糊涂地继续滑落。

S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wxz-info@cnd.org](mailto: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